

纪念父亲马恒昌百年诞辰

一位开国劳模的家事

马春忠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位开国劳模的家事 / 马春忠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08-3891-3

I. 一… II. 马… III. 马恒昌—生平事迹 IV. K826.1D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77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4.625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在中国著名工运活动家、开国劳动模范马恒昌诞辰 100 周年之际，《一位开国劳模的家事》一书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黑龙江省总工会和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了。这是对老英雄马恒昌永久的缅怀。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整理、发掘和传承马恒昌及马恒昌小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恒昌同志是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的创始人、职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开创者、我国职工大规模劳动竞赛的奠基者和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卓越组织者。他曾任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中国工会第八、第九届执行委员；齐齐哈尔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党委副书记等职。他先后十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本书作者马春忠，系马恒昌同志的长子，齐齐哈尔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副编审、《青年文学家》杂志社原副主编。

他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笔触，通过自己和家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从“家事”的角度记述了马恒昌和他的小组鲜为人知的故事，以纪实的手法多侧面地展示了马恒昌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此书不失为一本工人阶级光荣传统与使命教育的好书。

阅读《一个开国劳模的家事》一书，不由得让我们随着故事情节重新走进了老英雄马恒昌的内心世界，感悟他的人生态度，品味他的人生价值，领略他的正派为人，尽享他的精神财富。阅读此书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与呼唤，是一次灵魂的洗涤与净化，同时也是人生意義的追寻与定位。

《家事》是记述老英雄马恒昌如何看待和处理家事、琐事的书。然而，“家事”不小，它连着国事、民事、天下事，它再现了马恒昌同志从报恩到报国、从自发到自觉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历程；小事不小，细微之处见精神，让我们从细微的小事之中，更深刻地理解马恒昌同志的那种国事大于家事、事业重于一切的无私奉献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同时也让我们从家事的角读懂马恒昌，读懂他的人生，读懂他朴实正直的为人品格、律己宽人的人格魅力、无私奉献的示范力量。

老英雄马恒昌一生朴实无华，内向少语，然而，他不语则已，一语便落地有声，言简意赅，寓意深远。他一生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却留下了“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要想当好头，就要带好头”“工作要向上攀，生活要向下看”等让人

终生难忘的至理名言，这不仅是老英雄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人生的真实写照，也为后人立下了对人生、事业追求的座右铭。

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马恒昌精神是马恒昌小组精神的起源和基础，马恒昌小组精神是马恒昌精神的延续、传承与发展。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神为企业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内涵，是企业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品牌，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无形资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马恒昌同志生前所在企业的新一代领导者，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力传承与弘扬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神，鼓舞和激励广大职工勇挑历史重担，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做新时代的领跑者，为更好地发挥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保障基地的历史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曲 波

（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7 年 6 月 8 日

目 CONTENTS 录

父母苦根	(2)
大姐出嫁	(6)
锁我求生	(9)
领高粱米	(12)
献千分尺	(15)
都是兄弟	(20)
挑战自我	(25)
表兄进厂	(34)
免费“旅店”	(37)
堂弟求职	(41)
二弟务农	(44)
二妹随军	(46)
三妹心愿	(50)
四妹下乡	(54)
小妹待业	(59)
一千比一	(64)
万里取经	(67)

“常委”家训	(71)
一件大衣	(77)
宴请中村	(81)
十学大庆	(83)
特殊疗养	(91)
团队精神	(97)
生命品牌	(106)
谊厚情深	(112)
孙承祖业	(120)
家祭百年	(124)
后 语	(131)
马恒昌生平	(133)
马恒昌小组基本工作法	(135)
马恒昌小组历任组长简介	(138)

皓月当空，踏雪归来，凝视父亲遗像，思绪万千，夜不能寐。

2007年7月，是我父亲马恒昌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老人家仙逝的第二十二周年。

往事并非如烟。

有关父亲和他的小组事迹的通讯报道和纪实性作品，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为父亲的口述整理出版了《车床边的风云》，收集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砸碎铁锁举红旗》集子中。距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青年也变成了老年。退休这十二年给了我宽裕的时间，让我对父亲的人生做了系统的、认真冷静的回忆和思考，使我逐步认识到，父亲苦尽甘来的一生，为人耿直忠厚的一生，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一生，在工人阶级成员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始终在为企业的产品和自身的人品精心地打造着驰名品牌，时刻在为国家和企业争光、为当代工人阶级塑像。

在我们这些儿女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给了我们宝贵精神

财富、让我们受益终身的慈父；在企业里、在社会上，他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同时又是一位令人尊重和爱戴的著名开国劳模、著名工运活动家。为了纪念父亲诞辰百年，缅怀父亲的功绩和品格，我和弟弟、妹妹以及亲朋好友共同回忆撰写了家事篇，力图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党对父亲的恩泽，时代对他的挑战，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对他的陶冶和小组工人对他的帮助，多侧面地透析父亲的人格力量和多彩人生，从而为我和我的后人留下一个真实平凡、可歌可颂的前辈形象，也为齐二机床集团公司和上级组织研究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神，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资料。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我就尽到了一份责任。同时，这也权做对老人家百年诞辰最真挚的纪念吧。

父母苦根

我的父母，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张台子区所辖的两个不同贫困村的贫寒家庭。一个叫东马峰台，另一个叫洪荒地村。父母的结合真可谓是“苦根相连”。

我的爷爷和奶奶，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们苦难的一生，可以用“长工”和“奶妈子”这两个词来概括。

父亲七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三，也就是1914年的农历小年，爷爷一年的长工日子就该结束了。可是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非逼迫爷爷将其女儿送回婆家不可，说女儿在娘家过年不吉利。爷爷无奈，只好将其女儿送走；等到天黑车才往家

走，刚到火车道口时，马被火车鸣叫惊吓，车翻人亡！奶奶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奶奶就寡守三个幼儿，在没有“天”的漫长岁月里，用泪水混着苦水，搅拌着糠皮和野菜煎熬着日月。

穷人的孩子早立事。父亲十岁时，就给地主赵国栋家当“半拉子”，每天要放四十多头牛。牛一放出去，就占满了半面天。由于饥饿，父亲个小体弱，根本上



不去牛背，只能随牛四处奔跑。夏暑无衣，只有光胸赤足，手脚被扎得流血化脓；冬寒无棉，腮颤臂抖，手脚只能在牛刚便出的粪便中取暖。

在苦盼中，父亲终于年长了几岁，他到“千斤寨”（抚顺）投奔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企盼在那儿能找到活儿干。矿主嫌父亲年小体弱，不准他进矿挖煤，父亲只好从煤灰中拾些煤核卖钱度日。

转年十六岁了，求人送礼，父亲才被准入抚顺发电厂跟一个日本人学徒。

此时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炮轰“东大营”，还距七八年之久，日本人在抚顺到处可见，他们开工厂、凿煤矿，为所欲为，中国政府熟视无睹。

俗话说：“学徒学徒，三年为奴。”跟中国人学徒尚且如此，日本人就更不把中国学徒当人看了。这个日本人不仅不教技术，连车床边都不让靠近，只能在工具箱边立着。父亲记得很清楚，他入厂第二天，这个日本人大叫：“啥西的拿来！”父亲根本听不懂他的话，拿了几样工具都不对，这个日本人拿起工具照父亲的前额就打去，顿时血流满脸。父亲真怒了，刚要还手，可想到奶奶还要靠他养活，只好忍下了。从此，父亲更加留意这个日本人干活，每天都从图纸和干出的工件中，进行反复对照和琢磨，慢慢地把手艺“偷”到了手。

1926年初，父亲十九岁了。他只身到“奉天”（沈阳）兵工厂做工。心想：这回不会再受日本人的气了，哪曾想，沈阳的天空更加黑暗。工头吃空饷，厂长深居洋楼，视察大员中饱私囊，根本不管工人死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兵工厂被日本鬼子占领，工人死伤上百人。父亲一连两个月没到工厂去，手里分文皆无，讨要两天才回到乡下家中。

母亲见到父亲的如此惨相，惊呆了。

母亲名叫洪淑贤，她家境贫寒，除父母外，还有一位兄长，也就是我的大舅，叫洪长纯。大舅三十好几了，也说不上媳妇。后来，大舅的精神就不大正常，成天赤胸裸脚，东走西逛，唱唱咧咧，尾随一帮小孩。母亲十六岁时，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就到了马家，上侍婆婆，下抚儿女，白天种田，早晚还得侍弄房前屋后的菜地，左毗右邻都称她是“贤妻良母”。女人们经常喊道：“二嫂”“二婶”“老马家的”，

就这样，把母亲的真名实姓叫没了。

母亲特会过日子。全家的衣裤、鞋袜从来没买过，真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就连我们睡觉的炕席，都是母亲用秫秆自己编的。她对奶奶的孝敬，更为村里称赞。不光给婆婆端屎倒尿，还给婆婆洗脚擦背，照顾入微。母亲最敬佩奶奶“从一而终”。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天”，“天”没了，就得自己撑起一个“天”。母亲无怨也无悔，成年累月这样操劳，她是我们家最操劳的人。我至今都记得，每到年关之时，父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奶奶买个果匣子（各种糕点）回来。奶奶吃过之后，母亲就将剩余的食品用小竹筐悬吊在房梁上，防止孩子们偷吃；有时奶奶看不惯，要分给孙子们吃，母亲说：“小孩子吃的日子在后头呢！”其实，我们都早已习惯了，连口水都不会咽一下。

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真的是太漫长、太难熬了。可盼到1945年的“九·三”胜利，心想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中国会强大起来，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起来，可是，没过几个月，国民党的腐败便盖天铺地：农村土豪劣绅地痞无赖，榨吮农民血汗；城里资本家工头流氓阿飞敲吸工人骨髓。国衰民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已经是工匠的父亲，每月关饷是上百万元，可到头来连一袋高粱米也换不回。我们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生活——这就是旧社会一个工人之家的苦难历程。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时，爸爸四十二岁，妈妈三十五岁，饥寒交迫的前半生，终于结束了。

大姐出嫁

大姐叫马春霞，是父亲的长女。她从出生就没得好，那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小鬼子的“膏药旗”满街都是。母亲因吃糠咽菜而无奶水，大姐饿得哭不成声，患病又无钱医治，落下一只眼睛失明。奶奶哭天，妈妈喊地，她们不知磕了多少头乞求，用了多少土方治疗，大姐的眼睛依然残疾。

大姐六七岁时，自己就挎个小筐去挖野菜，或者去砍些柴草。过了十岁，大姐便跟随母亲到地里干活。晚上，母亲做饭洗衣，大姐就像小母亲一样，哄着我和弟弟。

大姐十六岁时，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为能带走一张嘴，母亲只好忍心将大姐远嫁二十多里外的一户农家。出嫁那天，大姐哭成了泪人。只有十二岁的我，乘坐一辆铁轱辘马车将大姐送走。

大姐的婆家在土岗子村，丈夫是个三十来岁的驼背人。从村子的名字，就知道是个穷乡僻壤之地，雨季水土流失，无雨地皮干裂。从驼背人的举止，就不难得知他幼年积劳成疾。大姐的日子怎么过？

1951年初，我们全家北迁到齐齐哈尔，母亲更加惦念千里之遥的大姐。后来听人说，大姐夫在内蒙扎兰屯找到一份工作，全家人在那里生活挺好，母亲才慢慢安下心来。但还是感到是自己把孩子坑了，有时真想过去看看，但家里一

大帮孩子离不开，就没去成。直到1960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收到了大姐的女儿来信，才得知大姐的婆婆心疼儿孙，怕忍受不了饥饿，非让他们回老家去不可。为此，父母都很生气，说他们的眼光太短，连旧社会都扛过去了，现在反倒怕了！

后来，姐姐和姐夫领两个孩子到齐齐哈尔，想让父亲找个工作。我一看姐夫的外貌，把我吓得够戗：脸上皱纹纵横，像刀刻一般，脊背更驼了，还抽卷烟，咳声不断，一句话也不讲。

姐姐这次来，很显然是给父亲添堵，我真想骂姐夫几句，但又觉得他太可怜，这不是姐夫的错。

就姐夫的自身条件，想找个看门打更的工作也难。其实，凭父亲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要是肯出头说句话给姐夫找份工作，让大姐家从农村迁过来，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可是父亲始终没有说出这句话。

父亲很上火，饭量明显减少了，话语也不多了。无论怎么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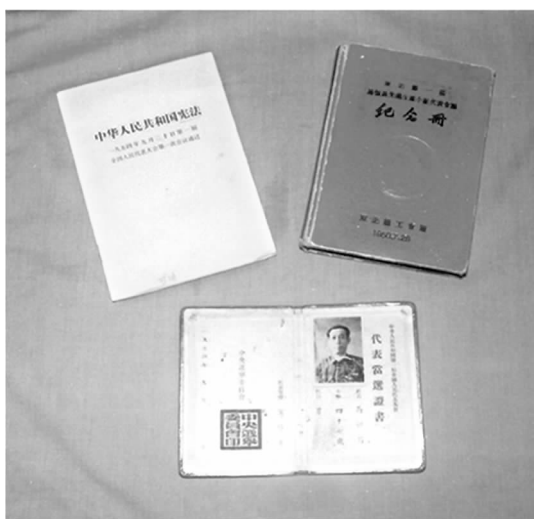


■开国劳模马恒昌。

姐始终是父母最大的牵挂。

父亲在开完二届五次全国人代会后，还特地从沈阳下车，到土岗子村看望了大姐。

父亲回来后，对母亲说，大丫头挺好的，不愁吃、不缺穿，临走时还给他们家扔些钱，总之，父亲说了些想让母亲宽心的话。



■马恒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和学习读本。

实情并非这样。1963 年经济困难还没根除，全国人民上下一条心，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到各位代表的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状况，就以每位代表是代表 50 万人民来参政议政为由，决定每人每月

下发 50 元人民币作为代表的“车马劳顿”予以补贴。

50 元人民币，这在当今不值称道，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能供养六七口之家！

父亲对此感动不已，他自己不光谢收，还联合一些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一方面要尽好代表职责，同时还要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此举受到了朱德委员长和彭真副

委员长的高度评论，称赞他们“最有觉悟”。

父亲让我们给大姐写信告诉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我们就更不能害怕困难”！

后来，我们收到大姐的来信，再也不提她们生活困难的事，为此，父亲很高兴，但还是从节省的全国粮票中寄些给她们。

锁我求生

我是父亲的长子，1935年5月生，比大姐整整小四岁。父亲告诉我，因为家境贫寒，我降生不久就患了不知名的病，很快就没了气息。奶奶将赤身裸体的我放到屋地当央的谷草上，准备从窗口送走。母亲几次哭断了气，奶奶哭述自己没积德。奶奶说：“老二呀，把孩子送走吧，过了前半夜就不吉利了。”父亲就是不动。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父亲两眼紧盯着我，他突然看到我的胸口动了一下，就大喊：“妈，你看动了。”奶奶立刻俯下身去，将我抱起，脸贴脸、心挨心，“真的没死！”母亲赶忙接过我，眼泪哗哗地淌。

父亲说我当时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奶奶说：“这孩子命大，得给他戴个长命锁，就能把他锁住。”

父亲对我说，他根本不信鬼神，但奶奶的话父亲不敢不听。父亲在沈阳找到一个“仙婆”，从那里买来一把袖珍铜锁。“仙婆”告诉父亲，这把锁必须在孩子的脖子上戴十年，

不能随便打开，否则不灵。

我的小名就这样叫开了。

我到八岁时，还念不起书。每天除了挖野菜、打柴草外，就到河沿坝下的庙堂窗外偷听私塾课。日积月累，我就能将《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从头背到尾，当然字不认识，词意更不懂了。

1948年，东马峰台村的所有庄稼地都闹了干旱和蝗虫灾害，颗粒不收，学堂也黄了，村民们都四处去乞讨，我们家更不例外。

这一年，奶奶病得很重，多少天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可把母亲愁坏了。奶奶有一天突然对母亲讲，她要喝点包米面粥，就打发我去讨要，弟弟春厚也要去，母亲说：“太远了，得走出二十多里地，外边下大雪还有狼。”可弟弟执意要去，我也没办法。母亲生气了，说：“你不怕狼把你叼去，你就去，没人管你！”

雪天路滑，寒风入骨。我和弟弟在往家赶时，天都黑了，真的听到了野狼的嚎叫声，吓得春厚缩成一团，蹲在雪地上大哭。

家里掌灯了，还不见我和弟弟归来，奶奶和母亲都后怕了，奶奶咒骂自己：“我八成要死了，干吗要喝包米面粥……”

母亲听到门外孩子的踏雪声，赶紧跑出去抱着我和弟弟哭。

1945年10月，父亲为给我摘锁，将我带到沈阳。那个“仙婆”上上香，让我跪在地上，然后就浑身哆嗦起来，仿佛真的是神仙附体一样自言自语，最后将锁打开。